

“守常”“仲甫”回北大,《觉醒年代》进燕园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都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作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族富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生……”

4月20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身着长衫的“李大钊”“陈独秀”,带领北大学子们庄严宣誓,一场震撼心灵的对话正在上演。两代青年的铮铮誓言,凝聚着信仰的力量,跨越时空,回荡在春意盎然的燕园。

触摸历史,与新文化运动先贤相逢,与“南陈北李”相知……今年初,一部高口碑的电视剧《觉醒年代》让无数观众热血沸腾,仿佛回到那个风云激荡的变革时代,与一位位爱国志士“邂逅”,深切感受百年前“新青年”们为寻求救国出路上下求索的艰辛,与民族觉醒的伟大历史进程同行。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觉醒年代》中大部分剧情围绕北大师生展开。为此,“五四”前夕,《觉醒年代》主创团队走进北大,与师生分享拍摄故事,重温“觉醒”记忆,探寻百年前爱国青年和中国共

产党的初心。

在剧中,演员于和伟塑造的陈独秀形象丰富生动,是无所畏惧、意气风发的革命斗士,也是不善言辞、满怀深情的普通父亲。谈及角色,于和伟说,这是他第3次扮演陈独秀,对陈独秀有了更全面和丰富的理解。

在他看来,好看、生动的角色塑造,才能更有传播力,才能与观众产生共情。“在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和剧本的过程中,我不仅感受到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风骨、精气神,还感受到了他们身上的烟火气。”于和伟说。

在北大红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曾为学生们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讲授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1920年,他在北大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觉醒年代》剧中,演员张桐所饰演的李大钊形象立体生动,对理想信念坚定执着,对劳苦大众深切同情,对学生师者仁心,对妻儿饱含深情,令观众共情感佩。

“我一开始并没有胆量挑战大钊先生

的角色,后续才慢慢摸索出来,希望能演出大多数人心中的大钊先生的艺术形象。”在张桐心目中,李大钊极具英雄色彩,为演好角色,他反复研究李大钊生前的视频影像和相关史料,希望能从举手投足、思想脉络里更深入了解李大钊。

谈及剧本创作,《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坦言,确实难度和挑战很大,因为要聚焦“红楼”,要追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源、追溯“红船”从哪里来,需要对历史和人物有深刻研究。他认为,在创作中须遵守既定的历史认同,让观众了解客观历史,并从历史中获得正能量。

“这部电视剧的热播,在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中引起巨大反响,值得祝贺,也令人惊喜。”研究李大钊多年的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杨琥认为,《觉醒年代》成功塑造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鲜活形象,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更深入了解建党历史、继承爱国主义精神,具有积极意义。

在《觉醒年代》中,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陈独秀不舍地目送儿子陈延年、陈乔年

出国,出国前意气风发的青年与之后二人在狱中脚戴镣铐、血肉模糊的牺牲画面不断闪回,他们短暂而又灿烂的人生,让许多观众“泪目”。

陈乔年扮演者马启越年仅17岁。谈起饰演经历,他说,一开始不知该怎么演这百年前的“新青年”,但到了片场后、当戴上冰冷的镣铐,瞬间就有了感觉。能出演这个角色,他感到非常荣幸。

“最近有一句话是‘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是《觉醒年代》的续集’,我看到后特别感动。”马启越说,“我感谢那个时代的‘新青年’们,为了国家他们可以舍弃自己,他们是当代青年的偶像。”

“面对风雨飘摇的山河,百年前的‘新青年’们,为了国家复兴无所畏惧、不怕牺牲,这种情怀就像火种,点燃了身处当下的我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郑方一说,“今天,作为北大新一代青年,我更感受到当代青年所担负的责任,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记者魏梦佳、邵思聪)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幽幽的微光下,绿色斑驳漆面的车床,静静陈放在中国工业博物馆展馆内。展品上方放置了一张仿制的第三套两元面值人民币,票面上清晰印着这款车床。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这台车床为什么印在了上面?

“这是主轴箱”“这是刀架”“这叫卡盘”……87岁的张贵卿,一眼认出了这个“老朋友”:“人民币上印的是中国人自己生产的第一台普通车床。”

车床是机床的一种,机床则被誉为“工业母机”,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部件都需要用机床来生产,包括机床本身。

“我1952年技校毕业,加入原沈阳第一机器厂担任车工。”张贵卿说,当时工厂里只有一台皮带车床。

靠皮带传动的车床加工零部件,一到“较真碰硬”时,就会打滑而“掉链子”。这种车床最多只能干干‘磨皮’的活儿,无法深度加工。”张贵卿说,即使这样的简单皮带车床,也还是“捡”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原沈阳第一机器厂里可用的东西几乎没有,厂房也几乎近废弃。工人们靠捡拾零部件,组装了这台皮带车床。

1953年,原沈阳第一机器厂更名为沈阳第一机床厂,被列入国家“一五”计划156项重点工程项目。“研发制造自己的车床是所有人的梦想。”张贵卿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开始新中国第一台普通车床设计。1955年8月,普通车床研制成功并实现量产。

“第一台普通车床出来后,厂子沸腾了。”张贵卿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工人们七嘴八舌地抢着说‘这块儿是我生产的’‘那块儿是我干的’,争得面红耳赤,大家伙儿是真自豪、真骄傲!”

“别看我们刚刚能自己生产车床,制定标准上一点没马虎,一共有包括精度等在内的18个检测指标。”张贵卿指着主轴箱说,当初这里噪音大。就为这个,厂子里添置了磨齿,把里面的齿轮重新磨了一遍。“当时车床的精度可以达到世界水平,量产后期供不应求,一度还出口国外。”

时光荏苒,机械机床的时代逐步落幕,数控机床逐步成为主角。

走进如今的生产车间,以往靠工人手上“准头”控制的传统机床已经看不到了,一台台自动运转的数控机床旁,只有几名工人在操作面板上输入指令。

作为工厂研发团队的一员,技术员孔令友表示,数控机床时代,自主创新面临不小挑战,但我们有实现从有到强的信心和决心。

(记者汪伟、于也童) 新华社沈阳4月21日电

被印上人民币的新中国第一台普通车床

于国无悔

于亲有愧:海军一线官兵的家国情怀



海军某潜艇基地官兵举行重温入党誓词仪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王青摄)

过的退役潜艇。这也是她第一次看到丈夫的工作环境,窄窄的床,密不透风的舱。

参观出来后,他的爱人一个人坐了好久,结婚20多年,丈夫从来没有跟她谈过工作,她没想到,潜艇上的生活,原来这么苦!

在潜艇兵的心里,环境的苦永远比不上对亲人的思念和愧疚。

在官兵中,中士孔令辉算是幸运的。即将来远航时,家里打来电话,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爷爷病重,希望他回家看看。逐级上报后,上级当天批复,赶紧回去。

孔令辉见到了爷爷最后一面。更多的潜艇兵,在家人最需要的时候却失联在大

洋深处。

潜艇部队的官兵,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工资卡上交。没结婚的交给父母,结婚了的交给妻子,这样做的原因:一是自己用不上,二是万一遇险不用再做交代,三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不能陪伴的愧疚。

对于潜艇兵来说,相处的时间都不够,哪里舍得用来吵架。远航回来,打开舱门上岸,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家里报平安,哪怕听到的是抱怨,心里也不那么忐忑。副操纵长雷磊磊说:“怕的是,电话那头没有人接。”

抱怨归抱怨,为了不影响潜艇兵们的工作,很多的家属在家庭发生变故时,都默默

选择了独自承担。技师姜远升的岳母还托他给同村的姑娘介绍对象,点名要介绍个核潜艇部队的兵。岳母说:“你们的人,忠诚!”

因为忠诚,一代代潜艇官兵前赴后继。副艇长夏天的父亲,就曾在潜艇上服役。父亲又亲手将儿子送入了潜艇学院。遗憾的是,在夏天读大四那一年,父亲不幸去世。父子俩唯一一次同时身着浪花白的海军军装,是在父亲的葬礼上。

“我多么希望,在从军的路上,父亲能带我多走一段。”夏天说。

(记者黎云、孙鲁明)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老方的“网红”党史课

如何把党史讲得生动有趣,让身边人都爱听?江西景德镇市公安局民警老方花了26年时间,写下533篇讲稿、讲述36堂“网红”党史课,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老方名叫方永红,今年59岁,从部队转业后到景德镇市公安局。一张国字脸、平日不苟言笑的他,谈起党史故事,就像打开了话匣子,话语格外接地气。

景德镇市公安局思想文化宣传教育中心政治课堂内,座无虚席。老方走上台前,挺直着腰杆、整理了自己的警服。这堂党史课的主讲人老方,要给大家讲述发生在景德镇荷塘乡的故事。

60多年前,荷塘垦荒人克服千难万险,为开发建设荷塘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老方说,当年的首批垦荒人,有的比在座的民警还年轻,最小的才19岁,但他们依然选择背井离乡,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过上好日子。

从现在的情景到当年的原貌,从故事的细节到前辈的心声……老方的生动讲述,仿佛把在座的听众带回故事发生时空。“这样学党史生动有趣,由身边熟悉的同事来讲述党史故事,令人印象深刻。”景德镇市公安局民警戈颖说,“老方说党史”让我知道了当年创业的艰辛,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和工作。

为深入开展党史教育,景德镇市公安局挖掘方永红热爱党史、研究党史的特长,一方面鼓励他坚持研学,在人员、资料、平台上给予保障;另一方面利用“瓷都公安”“瓷都民警之家”等新媒体平台来开设“老方说党史”专栏,传播党史知识,对全市公安机关民警、辅警进行党史教育。

据景德镇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范有光介绍,截至目前,“老方说党史”栏目已发稿件533篇、累计50余万字,总阅读量超过500万次,已经成了“网红”党史课。

老方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后在部队服役期间经常接触老红军,由此养成了搜集党史故事的习惯。“现在我正在做的是把这些故事进行系统化梳理、撰写讲稿,即便是退休后我也要继续讲给更多人听。”方永红说,在他看来,学习党史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

“‘老方说党史’把学党史和新媒体平台有机结合,让党史学习由一时一地成为随时随地,以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百年大党的奋斗故事。”景德镇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邹永胜说。

(本报记者黄浩然,参与采写:石卫明)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原来会议确实多,来回奔波,让大家不堪重负。现在明显感觉会议少了,一般每周就到县里开一次会,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我们也有更多精力抓好自己的工作。”谈起最近的工作,河南省鹿邑县唐集乡乡长马廷俊觉得减负是最大的感受。

马廷俊的感触,源于鹿邑县今年年初开展的“转作风、进基层、大调研、听民情”活动。在走访中,鹿邑县共收集整理了意见建议8大类154条,其中反映最多的,就是会议多、文件多、督查多和形式主义问题。

鹿邑县委书记李刚说,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鹿邑县把学习党史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以“听、谈、查、访”

为载体,进一步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

为整治文山会海顽瘴痼疾,鹿邑县对各类会议做出严格规范,明确精文减会的标准和尺度,着力提高文件、会议质量,不发不切实际、内容空洞的文件,不开应景造势、不解决问题的会议,切实为基层干部减压减负。

实实在在的举措,带来了会风的明显变化。

以今年3月5日鹿邑县召开的一次县级会议为例,这次会议不仅把以往分开的目标管理、组织、党办、政法、宣传、统战六会合一,还严格控制发言时间,要求总结成绩一笔带过,安排工作简洁明了,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此外,鹿邑县还投资300多万元建设了覆盖县乡村三级的视频会议系统,全县

三分之一的会议采取视频形式召开,极大减轻了基层干部的参会负担。“身上的包袱轻了,大家干劲十足。”唐集乡套犁王村党支部书记刘国卿说。

“调研中发现,门类繁多的督查检查考核次数太多,乡镇疲于应付。”鹿邑县委副书记、县长胥茂森介绍说,有的乡镇甚至反映去年接受县级以上督查100多次。为给督查检查考核戴上“紧箍咒”,鹿邑县又对督查检查考核活动实行总量控制、计划管理,给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全面瘦身”。

“年初没有报备审核的,一律不准到乡镇督

查。”胥茂森说。

记者来到涡北镇灵子门村,看到村室大门两侧的牌子整洁规范。“原来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牌子,特别杂乱。现在县里规定只能挂村委会、村委、监委会三块牌子。”村党支部书记刘杰说。

为切实解决困扰基层的“牌子多”问题,鹿邑县对基层挂牌开展专项整治,清理了511个行政村和54个城市社区2000多块牌子。“现在的门口清爽多了,牌子减少了,上边来检查的也少了,我们有更多精力服务群众了。”刘杰说。

牌子少了,“指尖上的负担”也得减。

鹿邑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薛斌指着手机里的微信界面说:“现在办公室系统就一个政务工作群,在‘群山群海’里奔波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通过开展微信工作群专项清理整治,鹿邑县共解散、合并微信工作群743个,压减比例达到52.8%,让基层工作不再疲于“手机上”的应付,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沉到为群众办实事的一线。

(记者翟濯)

新华社郑州4月21日电